

直击
2026博鳌亚洲论坛

破解跨境支付“不可能三角”

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以“建设多元化跨境支付体系”为主题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如何突破传统跨境支付模式的瓶颈,通过多元技术与区域合作,在效率、成本与安全之间探寻平衡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论坛形成的一项共识是,真正的突破不在于追求某项指标的“单项冲刺”,而在于构建多元共生、互联互通的生态系统。



在“不可能三角”中寻求平衡点

“跨境支付有三个目标:效率、成本降低以及安全。通常我们只能实现两个目标,那如何共同实现三个目标?很难。”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锋在主持论坛时直言,长期以来,跨境支付依赖代理行模式,链条长、中间环节多、结算周期久,用户体验远不及境内支付便捷。

面对这一难题,与会嘉宾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自的探索与实践。中国银联董事长董俊峰在发言中形象地将全球贸易比作世界经济的“大江大河”,而支付清算体系则是“江河之上、静水深流的河床”。“河床稳水流就顺”,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相较于依赖金融机构层层代理与单一货币结算的传统路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呈现出由新市场、新技术、新业态

共同推动的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董俊峰分享了在多元跨境支付体系呈现出的三个新特征:一是以“南南合作”为代表的区域特征日益凸显,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纷纷培育本土数字支付系统,跨境支付变革重心正从传统发达市场向全球南方市场转移;二是新兴技术与跨境支付紧密结合,央行数字货币、账基网络、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正在加速应用;三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参与和广泛互联的模式日渐鲜明,二维码支付、数字钱包与现有支付网络的高效对接正在成为现实。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则指出,一个好的跨境支付体系,核心在于“系统”二字,而非某项单项技术或性能。“多元化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但在多元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多元之间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互联互通,也就是互操作性。如果没有,

用户会感到迷茫、很不方便。”

他进一步提出,评价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其指标也必须是多元的,不能仅凭某一项技术指标“跑赢”就断定其优越。“这有点像我需要有一个身体全面健康的人来干活,不是说单项冠军就能够把整个系统搞好。”周小川强调,评价体系的指标必须体现“适配性”,即系统性能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让用户满意,同时满足宏观调控与监管的要求。

贝宝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CEO邱寒则从商业视角补充了对“不可能三角”的理解。她指出,支付服务已经从“付钱那一刻”延伸至端到端的整合解决方案,涉及分期付款、争议处理、退货安排等场景。

“当你付钱那一刻,它不是交易的结束,是所有工作的开始。”邱寒同时强调,合规的复杂性往往被低估,不同国家对不同商品有各自的要求,一个解决方案覆盖所有国家非常困难。对于成本问题,她认为,“便宜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还要看价格当中包含了什么项目”,如果支付机构承担欺诈赔付责任,成本结构自然不同。

互联互通与互信如何构建

在多元路径探索的基础上,与会嘉宾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这分散的努力凝聚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多位嘉宾强调,多元化不等于碎片化,互联互通与互操作性是多元共生格局下的关键。

老挝央行副行长苏里萨·谭努翁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分享本国经验时指出:“如果我们开发出不同的系统,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系统连接起来,就会出现巨大的麻烦。对国内支付和跨境支付都是同样的原则,就是互操作性。”在他看来,正是基于这一关键原则,老挝才能在短短几年内从国内标准统一走向区域互联互通,实现跨境支付的跨越式发展。

周小川在回应关于如何推动区域互信的问题时也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但当前在支付领域多边模式的推进仍面临现实阻力:一是技术上的争论动态发展,共识不易达成;二是国别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激烈。

“但我认为,多边可以提出一个具有先进性、吸引力的‘模板’,让大家看到后愿意加入;同时,这个模板必须具备更大的兼容性与互操作性,甚至不必追求百分之百的统一标准,而是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实现相互转换的系统。”周小川强调。

“全球跨境支付正迈向多元共生的新纪元,银联将秉持支付为民的初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产业各方构建跨区域、跨业务、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矩阵。”董俊峰在发言中展望道,要在标准共建和互联互通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在系统兼容中织就全球同一张网,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建多元共生的支付生态,共创互联互通的价值共同体。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周义力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良好的跨境支付要“适配”不要“冲刺”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周义力)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建设多元化跨境支付体系”分论坛上,就支付体系的多元适配与区域合作路径进行了系统阐述。

周小川指出,一个好的跨境支付体系,核心在于“系统”二字,而非某项单项技术或性能。“多元化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但在多元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多元之间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互联互通,也就是互操作性。如果没有,用户会感到迷茫、很不方便。”

他进一步提出,评价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其指标也必须是多元的,不能仅凭某一项技术指标“跑赢”就断定其优越。“这有点像我需要有一个身体全面健康的人来干活,不是说单项冠军就能够把整个系统搞好。”周小川强调,评价体系的指标必须体现“适配性”,即系统性能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让用户满意,同时满足宏观调控与监管的要求。

围绕“适配性”,周小川从多个维度展开阐述。首先是互通性的适配。他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标准之争为例,当时国际上存在三大并行标准,标准不一导致消费者从国外带回的电视机无法使用。在长期难以达成统一标准的情况下,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最终通过一个兼容三种制式的转换芯片,实现了不同标

准之间的互通。周小川指出,当下在支付领域,即便各国采用的标准不尽相同,仍可通过二维码之间的相互转换、网关对接等技术路径,实现不同系统的互联互通。

其次是速度与合规的适配。周小川坦言,速度固然重要,但必须在便利性与反洗钱、反电信诈骗、防止跨境赌博等合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他特别提到,欺诈手段也在进化,即便在极短时间内,不法分子仍可能实现双重支付。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要求是“躲不过去的”,必须在事前、事中或事后环节加以落实。

第三是用户界面的适配。用户需要的是友好、便利且具备纠错机制的支付系统。“有些人说我这个百分之百都不会出错,其实世界上没有这种事,哪都有可能出错。”周小川提醒,不能以“去中心”或“点对点”的叙事掩盖系统背后的复杂性。

第四是成本与价格的适配。周小川直言,当前市场上许多支付系统宣称成本极低甚至免费,其背后往往存在交叉补贴行为。他指出,一些平台将支付视为获取流量的重要入口,通过支付服务积累用户数据,再将数据用于其他业务变现,或直接出售数据获利,以这部分收入来补贴支付业务。在他看来,这种商业模式容易导致竞争环境的不公平,也让用户在选择支付方式时感到困惑。他明确表示,成本并非越低越好,免费也并非最优选择,理想的成本应当是真实核算、公平竞争下的合理水平。

此外,周小川还谈到了汇率与汇兑环节的复杂性,以及流动性支持的问题。他指出,跨境支付一旦量级扩大,背后涉及的国际收支平衡、汇率透明度以及双边货币互换如何为零售支付提供流动性支持等问题,都必须纳入系统设计的“适配性”考量中。

“系统是多元的,要求是适配,不要求你在哪个方面冲刺拿冠军。”他进一步指出,适配性涵盖互通性、交易时间、用户界面、成本价格、货币选择与流动性支持等多个维度。这些要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技术迭代动态演进。

在谈及支付体系合作究竟应从区域多边试点开始,还是更多依靠双边努力来建立互信时,“我认为,多边可以提出一个具有先进性、吸引力的‘模板’,让大家看到后愿意加入;同时,这个模板必须具备更大的兼容性与互操作性,甚至不必追求百分之百的统一标准,而是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实现相互转换的系统。”周小川如是说道。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中国经济是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晗萱)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接受了媒体采访。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通胀压力持续,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在动荡中“站稳脚跟”。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我可以肯定,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提供这样的驱动力。”林毅夫说道。

林毅夫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中国增长的底层逻辑。他指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而中国在这方面具备两大关键优势。

其一是“后发优势”。中国人均GDP目前约为1.4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普遍在4万至8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中国仍有巨大的追赶空间。通过引进、学习与吸收,中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曾实现连续十年以上8%的年均增长,中国同样具备这样的潜力。

其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林毅夫指出,当前

我们正经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过去三次工业革命不同,这一次,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更重要的是,要抓住这次机遇,需要大量工程师和具备创新思维、扎实数理基础的人才。而中国每年有600万理工科专业毕业生,这一数字远超其他国家。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任何新想法、新产品都能迅速进入这个大市场,而且我们拥有各类应用场景”,在林毅夫看来,这意味着创新成果可以更快地实现商业化落地,推动正向循环。

此外,我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能够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与此同时,有效的市场与政府协同,是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

“未来十年中国保持年均8%的增长潜力并非过于乐观的判断。”林毅夫表示。

林毅夫并未回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在国际层面,全球动荡可能导致油价飙升、供应链中断、地缘冲突升级,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结构深度调整过程中,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每一项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只看到问题,而在于认清机遇,并将其转化为增长动力。”林毅夫说道。

政府工作报告将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林毅夫认为,这一目标的设定“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实际状况,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判断”,若进展顺利,甚至可能超越。“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一增长目标,不仅能提高民众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还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至少30%的力量。”而且,中国的增长是开放的,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如果全球局势动荡减轻,全球经济增长加快,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贸易国,中国的增长也将提速。中国有足够的空间来抵消、缓和外部冲击,保障自身发展。

此外谈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林毅夫认为,如今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79岁,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老年人仍可凭借经验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养老产业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